

目 录

编者说明

-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1)
-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 汪精卫 (1)
- (1926 年 1 月 6 日)
- 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 (20)
- (1926 年 1 月 6 日)
- 在国民政府欢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宴会上的演说词..... 鲍罗廷 (22)
- (1926 年 1 月 1 日)
-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席上之演
说词..... 鲍罗廷 (25)
- (1926 年 1 月 19 日)
- 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 (28)
- (1926 年 2 月 3 日)
- 二、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和国民军 (32)
- 一个志愿兵的札记 (摘录) 里根·阿连 (32)
- (1925 年 4 月—7 月)
- 关于骑兵的报告 (59)
- 与普里马科夫同志座谈的速记记录 (64)
- (1926 年 2 月 15 日)

附：《冯玉祥与国民军》前言	米罗维茨科 (82)
(1967 年)	
冯玉祥莫斯科之行日记	(97)
(1926 年 5 月 9 日—8 月 16 日)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	(126)
(1926 年 9 月 8 日)	
冯玉祥回国宣言	(128)
(1926 年 9 月 18 日)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	(133)
(1926 年 9 月 26 日)	
冯玉祥给仲甫同志信	(134)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	(135)
三、布勃诺夫使团与中山舰事件	(141)
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	蒋中正 (141)
(1926 年 4 月 20 日)	
关于“三二〇”事件的报告	斯切潘诺夫 (148)
(1926 年)	
关于“三二〇”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	斯切潘诺夫 (153)
(1926 年 4 月)	
蒋介石关于“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向国民党中央的 建议	(163)
(1926 年 4 月 3 日)	
蒋介石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167)
(1926 年 5 月 14 日—22 日)	
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	(172)
附 1：切列潘诺夫关于布勃诺夫使团的回忆	(173)
(1976 年)	
附 2：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关于中山舰事变	

的论述·····	(177)
附 3: 张国焘关于整理党务案的回忆·····	(180)
附 4: 关于国民革命的分歧——中山舰事件和布勃诺夫 使团····· (日) 毛里和子	(187)
(1977 年)	
四、加伦与北伐战争·····	(197)
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 1926 年国民党军事规划 ····· 加 伦	(197)
(1925 年 9 月 20 日)	
加伦对蒋介石计划的意见·····	(209)
(1925 年 9 月 20 日)	
北伐前夕 ——康奇茨日记 (节录)·····	(212)
(1926 年 3 月 20 日—4 月 18 日)	
加伦关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三期作战部署简述·····	(219)
(1926 年 12 月 16 日)	
附 1: 布勃诺夫听取关于北伐问题的汇报 ····· 切列潘诺夫	(225)
(1976 年)	
附 2: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节录) ··· 切列潘诺夫	(232)
(1976 年)	
附 3: 炮兵顾问的回忆 ····· 鲍罗金	(256)
(1974 年)	
五、北伐期间的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青团·····	(268)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致中国共青团的信 ·····	(268)
(1926 年 10 月 15 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	

央书·····	(273)
(1926 年 10 月 18 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声明 ·····	(286)
(1927 年 2 月 6 日)	
在中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 的报告·····	(287)
(1927 年 5 月 13 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296)
(1927 年 5 月 26 日)	
六、罗易来华与“四一二”政变·····	(302)
中国革命的意义····· 罗 易	(302)
(1927 年 2 月 22 日)	
一个警告·····	(306)
(1927 年 2 月 27 日)	
注意领导人····· 罗 易	(311)
(1927 年 3 月 9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 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	(314)
(1927 年 4 月 14 日)	
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 罗 易	(318)
(1927 年 4 月 13 日—15 日)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333)
(1927 年 4 月 16 日)	
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 宣言·····	(334)
(1927 年 4 月 22 日)	
七、罗易与中共五大·····	(338)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338)
(1927 年 4 月 29 日)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罗 易 (365)
(1927 年 4 月 30 日)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罗 易 (385)
(1927 年 5 月 3 日)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	罗 易 (392)
(1927 年 5 月 4 日)	
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	罗 易 (406)
(1927 年 5 月 4 日)	
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 民主专政和无产 阶级专政	罗 易 (408)
(1927 年 5 月 5 日)	
布尔什维克的党	罗 易 (417)
(1927 年 5 月 9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420)
(1927 年 5 月 12 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	罗 易 (431)
(1927 年 5 月 13 日)	
八、大革命紧急时期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435)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 独立性	罗 易 (435)
(1927 年 5 月 24 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	(446)
(1927 年 5 月)	
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 防御还是进攻?	(448)
(1927 年 6 月 9 日)	

罗易给冯玉祥的公开信·····	(463)
(1927年6月10日)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	(467)
(1927年6月15日)	
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	(469)
(1927年6月15日)	
国民革命纲领····· 罗 易	(471)
(1927年6月15日)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罗 易	(477)
(1927年6月20日)	
书记处致上海区委的信·····	(480)
(1927年6月23日)	
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 罗 易	(484)
(1927年6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摘录)·····	(487)
(1927年7月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	
·····	(489)
(1927年7月14日)	
党的机会主义史····· 蔡和森	(495)
(1927年9月)	
附：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	
问题的资料·····	(558)
(1963年)	
九、附 录·····	(584)
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584)
大革命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人员·····	(594)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汪精卫

(1926年1月6日)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所经过的政治状况，作一个总报告。这个时期当中差不多是两年，在这短少时期所能报告的，只是一些重要的事件，而且关于军事方面尚有蒋介石同志报告，财政方面有宋子文同志书面报告；不过说及政治，不能不连带到军事、财政方面，不说到便不能明了。所以兄弟今天所说，也要把关及军事、财政的说个大略。

这两年中政治状况，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第一次大会以后到总理北上奋斗，就是由13年3月至11月。

第二个时期是从总理北上奋斗到总理逝世，这个时期很短，但关系却甚大，就是由13年12月至14年3月。

第三个时期是从总理逝世一直到现在，就是由14年3月到15年1月。

先说第一个时期：自从第一次大会发出宣言，说明中国之现

状，解释三民主义之真谛，并决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纲，大会闭会后，自应该遵照政纲去实行。但可惜那时种种障碍都还未除去，党的最高权力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理当时要把军事上的同志都加入在内，所以如杨希闵、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都任为中央执行委员，如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都任为中央监察委员。总理之意是想将军事上的同志合拢起来，实行大会的种种决议案，使大家能真实在主义之下共同奋斗。不料这个意思却绝对不能实现，杨希闵、刘震寰都在广州有最大的军事上的势力，却都不愿意真心实行总理的主义的。其时许崇智同志还在上海，至3月后才回广州，谭延闿同志孤军驻在北江，后来以出发东江受杨希闵军队之压迫，生存尚且不敢必，更何从说到发展。虽然由总理召集各将领开过几次军事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提案，到底亦是阳奉阴违，绝无办法。一次总理见得湘军太痛苦，十分受不住了，他们当时有四句很伤心的话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埋。”但刘杨部下却盘据要津，把全省财政通通拿在手上，简直不肯放松一点给湘军可以生存。记得有一天，总理在军事会议席上有过十分沉痛的话，他说：“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到广州，正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是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当时杨刘诸人听见了这话都说“大元帅今天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都服从你就是了”。总理因此才提出财政统一的办法。这个议案当时是一致通过了，但

后来一点没有实行，各军依然是就自己势力所能及的，就随意抢收分割了去，到底是毫无办法。到9月13日，总理决定北伐，委廖仲恺同志做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又兼广东财政厅长，把财政全权交廖同志一人负荷，总理就和谭延闿同志出发到韶关。当时廖同志有一个通电是很沉痛的，电中说及广东的财政情形，如果各军都肯捐除私见，则拿现在的收入借给各军是很够的；如果各军仍旧是任由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随意剥削人民，则必至军队不能打战，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穷苦。这电的目的在劝各军交还财权，各军也跟着发出许多响应的电，但却止是一个空言，没有一个人肯交一个钱出来。廖先生因此亲到韶关，再见总理，说明在这个情形之下，叫他做财政当局也是无用的，不特不能实行什么财政计划，就想筹一点饷也是没法子的；与其使他做财政当局，不过是空替大元帅多担一个恶名，不如准他辞职，还容易使人民知道不法军队把持的罪过。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财政当局，专在中央党部办理党务，并任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实心从事政治训练的工作。这时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是这样情形，简直是万事都无从办起，与第一次大会以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但自从蒋介石同志受总理命令组织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和廖同志及各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业打好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此事蒋介石同志另有报告，此时不必详说。此外还有两件大事也于革命事业的基础有极大的关系，而且和军事是联络在一起的，一是外交方针；一是农工运动。农工运动中央党部另有报告，如今把外交方针叙述一过。

要叙述外交方针，必要补说总理联俄一切的经过。本来总理致力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便不能不取消不平等条约。既要取消不平等条约，便一定要问到这些不平等条约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由此推究，即知从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后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一直到庚

子联军后的辛丑条约，以至民国4年的日本二十一条件，都分明是帝国主义者之作祟。故此反对帝国主义，实是总理的、亦即本党的向来目的。不过在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一个口号，到民国元年1月1日，总理就职临时大总统宣言才说出：“吾人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同时要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这两句话，实在即是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真义。不平等条约的罪过，就是要中国单尽义务而绝无权利；所以那时虽没有明言取消不平等条约，但单这两句话说起来，已很惹起外人的注目了。民元2月，总理辞职来到上海，赴过一次租界外人的欢迎会，就已经直白说过，他所要求于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我们中国；这可说是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第一声。但从这日起，外人的报纸便开始讪笑总理，决心帮助袁贼世凯去反对中国的革命党了。外国帝国主义者更答应袁贼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东南的战事；袁贼即利用大借款以扫平东南几省的革命党，因此有民五的洪宪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再利用段祺瑞给以参战借款及各种借款3万万以维持日人之二十一条件。此时可说已是革命党与帝国主义者短兵相接的时期，无法而可以避免的了。民六俄国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攻击苏俄，诋之为过激，诬之为地狱；但那时总理便说俄国革命必定成功，欧战中的同盟国、协商国都一定失败，民七总理在广州辞去大元帅职，复回上海，因为深恨帝国主义者之日日把苏俄造谣，曾打一个电与苏俄，庆祝他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去奋斗。其时世界上的交通机关都在帝国主义者的掌握，电报是不易打去的，很曲折的才托美洲的华侨同志打给俄国。列宁此时正在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总理这一封电，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总理与俄国的同志虽然在欧洲亡命时也曾有会过面，彼此讨论过革命的事业，知道他们的旨趣，但打电致意，却以此为第一次。

到民九、民十间，苏俄已经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的封锁，能够

用其余力来帮助世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列宁更决定了两个计划：（一）对西方的被压迫阶级，助他们联合起来；（二）对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也助他们联合起来。他派到东方的同志有一个叫做马林，马林在民十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师次桂林，马林去见他，总理当时曾打一封电到广州给廖仲恺同志和兄弟两人，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深信他建国方略里的实业计划，一定能够实行；并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总理联俄的起点了。可是马林由桂林来到广州以后，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掉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暗相符合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并且他断定香港帝国主义者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对别人如何说则不得而知。是时中国共产党曾和吴佩孚有过来往，马林也曾去见吴，他说吴的才力比陈炯明高过十倍，但可惜他总不懂什么是政治。兄弟因此联想及以前曾有一部分同志批评李大钊同志不该和吴佩孚来往。须知道在那时候李还未加入本党，他拿共产党员资格与吴来往确是有的，他想用吴帮助共产党做国民革命事业，这也是革命党常有之事，有什么可以反对。一直到民国 11 年 6 月 16 日以后，总理蒙难广州，8 月 15 以后亡命上海，其时中国共产党员很替总理抱不平，才陆续来加入本党。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来的。李当时曾对总理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不知总理能否许可接纳他。总理答他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便多起来了，后来苏俄又派越飞到中国，他到上海时曾见总理，并且曾联合发表一个宣言，大

家都承认中国现在最急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不久越飞因为抱病，由上海到日本东京，总理命廖仲恺同志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12年春间，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其中实有原故的。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间，总理更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蒋同志到莫斯科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斯基诸人，经过一番切实的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后日回国改组本党和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国携手了，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非帮助总理不可，因此才派鲍罗廷先生来到广东。其时正当陈炯明、林虎的军队陷了石龙，攻到广州近郊，用尽了滇桂粤湘鄂豫诸军才把他打退，鲍先生到粤后，与总理商量许多，才决定改组本党，因此才有13年1月本党改组之事。可惜的在第一次大会时，恰正接了列宁逝世的凶耗，总理当时甚觉悲痛，曾停会两天志哀，并亲自出席追悼列宁大会，演说他哀悼列宁的感想。大家须知，这时各国还没有一国承认苏俄，虽然第二国际的首领麦唐纳正在初就英内阁总理之职，但和苏俄还未有恢复国际的关系，而我们广州的革命政府却已明白为列宁开追悼会了。其后俄国复派加拉罕到中国，商量中俄协定事情，苏俄当时本也知道如果和广州商量，这个协定很可以使中俄关系更加明了，但我们的政府尚在实力未充，即使订定也效率很小，所以不能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确实的取销一切不平等条约，便和什么人订定也都是于中国有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订定了中俄协定。其时兄弟刚奉总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志商

量进行北方党务，曾和加拉罕谈过，他直说他也晓得曹锟不能代表中国的，不过利用曹锟现在的地位，商定了中俄关系，把从前俄皇时代订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通通取消，先把此事作一个结束而已。中俄协定成功后，更使本党与苏俄的感情又深一点。但因此同时更受帝国主义者的污蔑，他们见得本党联俄，无法破坏，就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国文报纸日日造谣，犹以为未足，更想到利用实力来破坏，因此遂有是年10月15日商团之变。此事原委：因为8月1日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由粤汉路管理许崇灏介绍到军政部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之后不到4天，大批枪械便已由挪威船运载入口；总理当时非常震怒，因为各国卖给军火与中国人民，必须先得到中国政府之许可，才可以订立合同，如今领到执照止是4天，枪械便已入口，显然是老早交易妥当，且已经运到，不过等候骗到执照，才火速进来。所以总理便把枪械扣起，并且从严查究。但因此便引起商团之罢市，英国帝国主义者竟敢公然于8月27日致一件类似哀的美敦的通牒给我们的外交部，说是听闻我们已定开炮攻打商团，如果是事实，英国的海军司令官也就命令舰队开炮攻打我们的官吏。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实是同等的国耻；以总理之志气，此时更愤到不可言状了。可是因为当日的环境太恶，也不得不要对于商团委曲求全，这也并不是因为怕外人的势力，实在因为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这班骄兵悍将已经和商团勾结，不肯奉总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团，而商团因为恃在他们有两个后盾：（一）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二）是我们政府统治下的骄兵悍将。晓得我们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10月10日的惨案，商团挟持枪械，把双十节徒手巡行的学生、农民、工人肆行屠杀，连死及伤至有数十人之众，政府至是不能更忍了，只得把自己尚能调动的军队如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樊钟秀的豫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合拢起来，于是月15日才把商团打倒。因为打

倒得很迅速的缘故，到后来商团派人到港要求港督出兵，港督说：“已经完了，来不及了。”这便是商团勾结帝国主义来推倒革命政府的一段故事。商团之所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所以利用商团做工具，固然因为总理以联俄为外交方针，故不惜百端破坏；然农工运动之主张，早已于第一次大会宣言中解释明白，是年并曾开过实业讲演会，说明了总理的实业计划和本党的政纲，一面帮助农工，一面也保卫商民，不用说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两项政策，于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什么不利，而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正是对于经济落后的现象为对症发药。无如那些土豪买办，却着实冥顽不灵，认为这就是过激，这就是大逆不道；其冥顽不灵的状态，恰如从前官僚绅士反对民主制度，认为犯上作乱一般，遂至不恤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反噬革命政府。当时革命政府外则受帝国主义之欺侮，与北洋军阀之压迫，叛军之侵扰，内则受骄兵悍将之牵掣，土豪买办之毒螫，真真是重重迫胁，几乎窒息。在此时期，本党除了忍辱负重，准备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实无何等表现。是为第一个时期。

现在要说到第二个时期了：这个时期是由总理北上起至逝世止。总理北上之目的，当时很多人以为总理是要和军阀合作，和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去分政权，这是错的；但是总理也知道国人会有这种误会，故此到了上海之后，便邀上海全体新闻记者谈话，说道：“我这次北上是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由这一段话看来，就可知道总理北上之目的是早已决定的了。当时总理还说道：“我负着这个责任北上，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随后总理并且曾到日本，要求日本民众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帮助我们中国革命，撤销不平等条约，所有议论都载在《孙中山先生经过日本之言论》一书，不必详细报告。原本总理到上海时已受租界外人的压迫，后来由日本到天津，法

领事竟不许总理通过法租界，更不许在法租界住。北洋的军阀因此便说总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总理的主张和帝国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当然会引起的反动。记得当时张作霖也曾和兄弟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要和孙先生要好的。”当时我答他说：“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呢？因为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张作霖至此，见语不投机，便不再说了。因为他们这时正在和外交团商量，把尊重不平等条约做承认临时执政的条件。到12月14日，许世英、叶恭绰两人到天津见总理，总理这时的病略好一点，就问他：“听说临时执政已经接受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的通牒，是不是呢？”许、叶两人答：“是的。”总理当时便很生气，说话也比平常洪大而急促，我劝总理不必再多说话，总理才对我说：“你和他们说去罢。”总理在这时候，虽然是病，从未有发过热，自从听了段祺瑞接受外交通牒这一段话，着实生气，是晚便发热起来。固然总理所患的病是肝病，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当时病的加重，可以说是实在因这一气的。后来我和许世英、叶恭绰两人说：“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事，原不只是孙先生的主张，自巴黎和会就已经提出；后来因为巴黎和会会长克里满梭说，这事不是巴黎和会所能解决的，可以留待将来国际联盟去解决，所以和会才把这案保留；以后到华府会议，我国还是提出的。这是全国国民的运动，你们单是要弄稳一个执政的地位，并连这件大事也轻轻去掉，如何做得？”他两人问我怎样办？我说：“你们执政覆牒可以说，外交团的来牒暂时可以承认；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是全国民众的要求，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现在执政正和广州革命政府的领袖孙先生合作，孙先生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为当务之急的，执政当然同意，并

且要帮助的。”如此可谓最低限度的让步了。许叶二人都说：“好，我们就这样告诉执政，这样办罢。”是晚我们把此事报告总理，总理说且看他们怎样再算。谁知他们后来对于此事竟没有办到。12月31日，总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当时总理是打算病好再来奋斗的，不料段祺瑞此时却主张召集善后会议，以替代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总理为委曲求全起见，于14年1月17日通电（就是令人注意的筱电），主张善后会议应加入职业团体代表，以为如果达到这个目的，即是有真正的民众主张在内，则我们的预备会议的主张，也可以退让；谁知段祺瑞对这一点也没有诚意，所以总理才吩咐党员不许加入善后会议。到1月26日，总理的病愈重了，其时就有一部分的不肖党员，不遵党的决议，加入善后会议；至于冯自由、江维藩等又组织什么同志俱乐部，不惜变节卖身，以达他升官发财的目的，这班人还说我们利用总理的病以破坏孙段合作呢。以上就是总理和段祺瑞绝交的原因。总理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虽然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不能实现，然一般民众却已为总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拥护此两大主张。所以总理逝世之后，北京民众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来，各处反抗帝国主义之高潮及最近北京倒段之大运动，都是总理所播下的种子；总理虽然壮志以没，然其成功已不远了。

如今更说到第三个时期：自从总理北上以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又想作怪了。本来总理当出师北伐的时候，已经早把围困惠州、并驻扎石龙的军队撤退，希望陈炯明也捐除成见，向福建方面进展。但陈炯明却反因此天天造谣，说某日解惠州之围，某日克复博罗，某日克复石龙，到后来晓得总理病重，更加欢喜，一面联络滇桂军做内应，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勾结曾毓隽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帮助他攻打广州，因此才有去年2月间陈军攻广州的事情。此时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担任保障北江，许汝为、蒋介石、廖仲恺几个同志出发东江，原约杨希闵、刘震寰

共同担任破敌的；无如杨刘袖手作壁上观，遂不能不单独作战，卒把陈军驱逐出潮汕以外。这事末始，蒋介石同志当有报告，故不多说。自从东江平定以后，就发现杨希闵、范石生等与林虎来往的函电，知道他们通敌的情形，这是陈铭枢旅长攻入兴宁以后，在林虎的司令部内找着的；此外更发觉了刘震寰亲到云南见唐继尧，叫他派遣云南军队攻打广西、直下广东的密谋，一路龙云带兵从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继尧带兵从桂林入桂；杨希闵却驻香港与帝国主义者勾结，更和广东的劣绅买办勾结，叫他们打电给北京政府，推戴他做广东督理。这般的阴谋毒计，已酝酿成熟，当时留在广州的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觉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头和许、蒋、廖诸同志商量，决定推倒杨刘的计划。关于军事的动作，也留待蒋介石同志报告，现在所说的只是政治上的设施。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单是打倒杨刘，而民国 12 年来的恶化政治不能根本改造，也是无用，所以在去年 6 月 1 日由中央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的决议案，大致说明我们欲整顿中国，必先从整理广东入手；而整顿广东，又必先从整顿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本党政治的训练。这决议案定了之后，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胡汉民同志立即接受，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下了实行的决心，再由兄弟到汕头见许、蒋各同志报告一切，大家都以为这决议案无论如何要尽力使之完全实现，所以 6 月 5 日以后，便开始攻击杨刘。6 月 12 日，杨刘打倒，我们便着手于国民政府之组织，大家有过极重要的商量，就是议决采用委员制。这个意思本来不自此时才有的，自去年 1 月 26 日总理入协和病院以后，在北京开过一次政治委员会会议，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张在总理逝世以后要实行委员制的，和在广东政治委员的意思都是一样。因为总理在时，在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在本国有这个元首；总理逝世以后，实在再无人可继，而且在本党总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说明是：“本